

东西方的桥梁

——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

架设

● 岳 峰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

架设东西方的桥梁

—— 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

Bridging the East and the West

— *Studies on the Scottish Sinologist
James Legge (1815-1897)*

● 岳 峰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架设东西方的桥梁/岳峰著.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4

ISBN 7-211-04704-6

I . 架… II . 岳… III . 理雅各—人物研究
IV . K835. 618.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1954 号

架设东西方的桥梁

JIASHE DONGXIFANG DE QIAOLIANG

作 者：岳 峰

责任编辑：李文淑 电子邮箱：211@fjpph.com

出版发行：福建人民出版社 网 址：<http://www.fjpph.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350001

电 话：0591-7533169（发行部）

印 刷：福州屏山印刷厂印刷

地 址：福州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350003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2

字 数：323 千字

版 次：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书 号：ISBN 7-211-04704-6/H. 169

定 价：1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当前，西方学界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范式正从以欧洲为中心转到以中国为中心，研究对象也相应地从西方传教士转到中国教徒。这是否意味着对西方传教士的个案研究可以划上句号了呢？由于地缘、族缘和语言的原因，西方学界对西方传教士的了解要比我们更多、更早。从某种意义来说，他们对传教士太了解、太熟识了。但是，他们对传教士所传教的对象则一无所知。因此，西方学界需要转变研究范式来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基督教史。反过来，我们对华人教徒的认识，要比西方学人容易得多。然而，由于语言和资料的研究限制，我们对西方传教士则知之甚少。所以，对中国学人来说，这种范式转变的时机还不成熟，更何况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整整30年时间，大陆学界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即使是寥寥无几的成果也是应景的批判文章，与西方学界对中国基督教史的大量研究相比，不啻天壤之别。近代传教士在中国扮演什么角色？是“殖民侵略分子”，还是“文化交流的使者”或是其他？对此，我们都需要对其逐个深入、全面地研究，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才是令人信服的。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大陆有关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成果中，能做到这一点的又有多少呢？在对西方传教士知之不多的情况下，中国学人如果跟随西方学界直接跳跃到对中国教徒的研究，那么，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上将出现断层。我个人的看法是，对中国学者来说，最好还是先补上所缺的这堂“课”，安下心来，克服近来学术界存在的那种急于出成果，尤其要出大成果的躁动心态，把中国基督教史上的一些重要的西方传教士分门别类进行研究，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基督教史的全貌提供翔实的基础。

岳峰君是我指导的博士生开门弟子。他受我这种看法的影响，入学后就有志于这方面的研究。他曾是著名翻译家许崇信的硕士研究生，现为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专于英、汉双向翻译。当我建议他以伦敦会传教士翻译家理雅各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

时，他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理雅各是中国基督教史和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提起东学西渐，尤其中国古代经典在西方的翻译和传播，理雅各为东西方学界所熟知。自 19 世纪末以来，他一直是中外学者关注的对象。研究这样一位众人皆晓的人物是艰巨的工作，研究如果没有特色，将会竹篮打水一场空，但岳峰君敢于做这种“冒险”。一半靠他天资聪颖，一半靠他勤奋拼搏。他终于获得了成功，应验了岳峰君家乡闽南所流行的一句话：“爱拼才会赢。”岳峰君的论文以独特的视野，另辟蹊径，多渠道地从国外收集到了以往学者未曾引用过的第一手资料，如牛津大学保存的理雅各个人及其家属未公开发表的手稿、信件。他凭借深厚的翻译功底和全面的资料，对理雅各的译著《中国经典》、《东方圣书》作了立体而细致的全方位分析。他从理雅各的宗教哲学理念出发分析理雅各的译介倾向，从理雅各的翻译动机出发分析理雅各的译文风格特征，从理雅各的少年经历出发分析理雅各的解经原则，从历史事件与国际形势甚至个人性情出发分析学者（比如辜鸿铭）对理雅各的评论，并将理雅各的译著与其他不同背景的翻译家的译著相比较研究，客观地评价了理雅各译著的得与失，有理有据，多有创见，发前人之未发，匡前人之所误。

岳峰君的论文是语言、历史与宗教的跨学科研究。事实证明，一篇好的论文往往是建立多学科整合和研究的基础之上。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只有积极应对，才能有所作为、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这也是我阅岳峰君论文后感触最深的一点。

岳峰嘱我写序，我因俗务缠身，一拖再拖，羊年即将过去，猴年即将到来，这个“债”再也不能拖到明年。事实上再忙，也不至于连写几千字序言的时间都没有，我担忧的是写序难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这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现在勉为其难而为之，如果真没有强加于人之嫌，则幸甚！幸甚！

林金水

癸未十二月书于福建师大康山里

中文摘要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大陆学术界尚未见对英国著名汉学家、伦敦传教士理雅各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而海内外学者既有的研究中，由于学科的限制，观点和思维的定势，对中、西文化以及英、汉双语的把握等问题也存在一定的缺憾。是为本书选题的缘起。

本书的资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 理雅各本人留下的文献，有尚未出版的牛津大学新波德雷安图书馆档案和已经出版的文献，包括自传、信件、译著、译论、词典、宗教论著、汉学讲稿等。2. 理雅各的家属留下的资料，包括传记、信件等。3. 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包括在国内外出版的中、英文论著、工具书、近代报刊和教会保存的资料。

本书通过解读法、综合分析法、逻辑论证法、整合描述法、比较法、统计法、田野考察法与翻译法，跨学科地从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教育学与报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在全面占据原始资料和学者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客观、系统、多角度、全方位地探讨理雅各的生平、学术成就和思想意识及其相关背景。

本书的研究主要有三个层面。其一、关于理雅各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贡献。理雅各是第一个系统译介中国经书的翻译家，其译本除了译文之外，还写有长篇的序言和详尽的注释，总体上表现出忠实、严谨的语境，学者的风格和宗教融合的译介取向。理氏译本虽偶有缺憾，但瑕不掩璧，至今仍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经典的标准译本，使欧美人士得以了解东方文明和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民族伦理道德之根本。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本书的创新性之一在于立体地将史料与译本语言机制的分析跨学科地结合起来，分析理雅各的翻译动机对其译文风格特征的支配关系，阐述他对中国神秘文化的译法与其宗教理念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分析了有关评论的可信度，避免了以往学者单层面的语言学研究或仅囿于理雅各在华活动的生平史实的资料收集和叙述。本书的创新性之二在于研究的全面性，研究涉及到理雅各的所有主要译

本，避免了以往相关研究中由于研究面狭窄而以偏概全的弊病。

其二、理雅各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首先，理雅各交游的华人基督教徒黄胜、王韬、洪仁玕、何进善父子等人因受其影响而成了颇有作为的社会改革人士，他们摒弃了惟我独尊的天朝大国的思想和传统儒学中迂腐的成分，追求、提倡新思想，崇尚科学技术，创办中国近代报刊，同时表现了对改革政治制度的热情，这些均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其次，理雅各推行补助书馆计划，兴办官学，设置神学以外的实用课程并设立奖学金制度的世俗化改革措施把香港教育引向了近代化；他在英华书院的课程设置、教材编译、与女生教育等方面的工作也表现出近代化的特色，有助于培养中国稀缺的专业人才。第三、理雅各主编的中文报刊《遐迩贯珍》以新闻为主，刊载有偿广告并介绍西学，为中国报业引进了现代意识。

其三、关于理雅各的传教生涯与宗教学术的研究。理雅各来华后，在困境中传教，皈依了一定数量的第一代基督教徒，建起了教堂，发展了一批牧师、教师与学者。在他传教的过程中发生过并非源于宗教因素的博罗教案，事发后，理雅各冒死解决问题，不动武，不报复。总体来看，理雅各的传教活动源于信仰动机，并非为英政府服务。而他反对鸦片贸易、赈灾解难、抗议英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等行为则表现出他良善的品性。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上，本书利用原始资料系统地发掘出了以往学者未曾知见的史实，进行客观评述，避免失之公正的可能。本书根据第一手资料整理了理雅各的比较宗教学的主要观点，并从思维定势入手分析其研究方法，同时论证了理雅各有别于大多数传教士的中西宗教融合倾向；并从中西思维的差异性分析理雅各在其译著中从信仰的本位和逻辑的角度对中国文化某些成分的批判。

总体来说，理雅各对中国文化的译介与在宗教等汉学其他领域的研究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是东学西渐的重要人物；他与华人的交游和在教育、报业方面的作为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发展，他在华的行为表现了对中国的良知。他的思想与其非国教家庭背景和苏格兰哲学、神学思想的影响有关。本书的总体创新性在于跨学科研究的特色、研究的系统性和新材料的发掘与运用。本书的研究除了填补

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一项空白，弥补海内外学术界就相关问题缺乏跨学科研究的缺憾之外，也为保存、传播中国文化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并有助于透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

本书分为绪论与七个章节。绪论回顾学术史并提出本书的思路与构架。第一章描述理雅各来华前的经历，包括理雅各的青少年时代和在马六甲的事业起步阶段。本章强调理雅各的语言天赋和治学态度，因为这是他日后汉学事业的重要条件，也分析理雅各年少时期的周遭环境，因为理雅各在华期间诸多的作为都与此有一定的关系。第二章描述理雅各在中英冲突之际来到中国时所面临的困境和他在困境中的宣教行为以及与华人的交游。第三章涉及宗教学，分析理雅各的宗教论著和宗教哲学理念，整理他的比较宗教学观点，阐述他的中西宗教融合倾向。第四章涉及报学，描述理雅各主编的香港第一份中文报刊《遐迩贯珍》。第五章涉及教育学，描述理雅各在港主持英华书院（英华神学院）和推行香港教育体制世俗化改革的过程。第六章涉及语言学的翻译研究，系统分析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的方方面面。由于在理雅各诸多的作为中，最终载入史册的是其翻译事业，因此本章在全文占据了最大的比重，分为六节。第一节分析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的背景、动机、条件与学者对其译著的评价。第二节解读理雅各在其译著中批判中国经书的思维。第三节描述王韬等学者襄助理雅各翻译的过程——这是19世纪中西学者规模最大的合作翻译——并分析理雅各与王韬对彼此的影响。第四节分析理雅各译本的文句，包括其总体的优势和在理解、表达上的一些纰漏。第五节通过三个风格典型的译本分析理雅各翻译的风格。第六节对理雅各笔下的中国神秘文化进行专题探讨。第七章描述理雅各回英国后继续研究汉学并出任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的经历，并分析其执教的理念。

关键词：理雅各、汉学、传教士、翻译、香港教育

Abstract

James Legge (1815—1897) is a well-known Scottish sinologist and missiona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This book is comprehensive studies on James Legge's career in China, his sinological achievement as well as his Christian ideas influenced by Scottish Christian philosophy and non-conformity family background. Based on the archives of the New Bodleian Library,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nd relevant publications, the book serves to visualize the Chinese culture in the eye of a westerner, to provide hints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among other things, to make up for the absence of systematic studies on James Legge in China's mainland and to create an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c link for the research concerned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rough a combined approach of history, linguistics and religion, the book makes an all-round analysis of James Legge's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faithful context and scholarly style, throwing light on the impact of motivation and thinking mode on the style and terminology of Legge's translation.

By analyzing James Legge's modernity in magazine-editing and college management, his secular reform of Hong Kong educational system, and his Chinese Christian disciples' political and journalistic achievements under his influence, it's concluded that James Legge had made contributions to the modernization progres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With the materials rarely found before, the book objectively proves that James Legge's missionary career serves his religious faith instead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his can be seen from his Chinese-directed doings such as his non-violent solution to a Christian case, his protest against opium-trade and the British army's joining in the crack-down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The book also clarifies James Legge's

Christianity-orientated comparative religious research, his criticism against some of Chinese classics in terms of reasoning and logic, and his inclination to merge Chinese religions and Christianity into one which is rarely found among missionaries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book consists of seven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concerned with James Legge's experience before coming to China. The second describes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Legge had to face in China and his consequent response. The third is an analysis of Legge's religious works and ideas. The fourth is a description of Legge's editing the monthly *The Chinese Serial*. The fifth chapter is an illustration of Legge's way of running Anglo-Chinese College (later Anglo-Theological Seminary) and his efforts to secularize Hong Kong educational system, which apparently contradicts his identity as a missionary. The sixth is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f Legge's translation. The seventh is about Legge's experience after returning to the United Kingdom, focusing on his career in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s the first professor of sinology and his sinological studies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Key words: James Legge, sinology, missionary, translation, Hong Kong education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从富商之子到传教士：理雅各来华前的经历	28
第一节 少年时代	28
第二节 结缘传教	30
第三节 准备远行	35
第四节 在马六甲	37
第二章 困境中的宣教：理雅各与华人	44
第一节 困境重重	44
第二节 报效信仰	50
第三节 在华交游	59
第三章 融合与比较：理雅各宗教学术研究	93
第一节 三教比较	93
第二节 融合倾向	108
第四章 走向中国报业的近代化：理雅各与《遐迩贯珍》	119
第一节 刊行问世	120
第二节 创新理念	123
第三节 抱恨无暇	128
第五章 近代化与世俗化的摸索：理雅各与香港教育	131
第一节 英华书院	131
第二节 世俗之路	142
第六章 半个世纪的翻译：理雅各的中国经书译本考察	151
第一节 译本概览	151

第二节	思维解读	172
第三节	中西合璧	187
第四节	忠实语境	201
第五节	学者风格	252
第六节	译介取向	281
第七章	老马反为驹，不顾其后：晚年在英国	312
第一节	汉学译介	313
第二节	执教牛津	319
第三节	告别人世	329
	结语	334
	参考文献	337
附录一	英、汉译名对照表	355
附录二	理雅各生平年表	358
附录三	理雅各在华交游人士简表	364
附录四	理雅各译著《中国经典》与《东方圣书》部分卷本主要内容表解	365
附录五	牛津大学新波得雷安图书馆档案原件复印件与有关图片	369

緒論

一、理雅各其人

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 – 1897) 是英国苏格兰人，伦敦会传教士、著名汉学家，出生于一个非国教的富商家庭。1839 年受伦敦会派遣到马六甲传教，任职马六甲英华书院。1843 年，理雅各将书院迁入香港。其后约三十年除了因健康问题或联系出版中国古代经典译著三次返英外，均在香港度过，此间他在传教的同时翻译、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探索中国宗教文化，改革香港教育体制，出版中文报刊。1876 年，理雅各成为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此后，他一直从事中国典籍的译述与汉学研究直至病逝。

在传教生涯中，理雅各曾保护中国民众，反对鸦片贸易，抗议英法联军镇压太平军并热心公益，表现了他的信仰原则与为人品行。1855 年起理雅各主理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铅印刊物《遐迩贯珍》，他的时代意识与创新理念使《遐迩贯珍》走向近代化，对中国报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与贡献。19 世纪 60 年代，身为传教士的理雅各却推波助澜地使香港教育事业由宗教教育转向近代世俗教育，有利于香港的未来发展，有“香港教育之父”之称。在宗教理论方面，他较早而系统地进行了中外宗教的比较研究，尝试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一体，因此成了西方人士中颇具争议的人物。

在理雅各的各种工作之中，影响最大的是翻译，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翻译了中国古代经典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作品，包括十三经的主体部分，以及道家和佛家的一些文献等，主要以“中国经典”与“东方圣书”两个系列译本推出。译本除了译文之外，还写有长篇序言和详尽的注释。如此巨大的中国文化翻译工程实为空前绝后，因而理雅各被称为英国汉学的三大星座之一，汉籍欧洲翻译三大师之一，也是儒莲翻译奖的第一个获得者。他的译本各卷陆续出版后，在西方引起了轰动，使欧美人士得

以了解东方文明和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民族伦理道德之根本。至今虽逾百年，理氏译本仍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经典的标准译本。他返英后的汉学教学则进一步推广了汉学在西方的影响，因此，理雅各在东学西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西交通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因而长期以来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兴趣。无疑，研究理雅各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大陆学术界尚未见对理雅各深入、系统的研究；而海内外学者的既有研究由于学科的限制及观点和思维的定势，对中、西文化以及英、汉双语的把握等等问题也存在一定的缺憾。是为本书选题的缘起。

二、有关理雅各研究的回顾

国内外历史学者、语言学者与宗教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理雅各作了研究：

1. 有关理雅各生平的研究

对理雅各生平作介绍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是他的后代为他写的传记。由于他们掌握和保存了理雅各生前的手稿和其他相关的材料，因此勿容置疑，他们所写的传记就成了后来学者研究理雅各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中理雅各第二任妻子汉娜的女儿理海伦（Helen Edith Legge）写的《理雅各：传教士与学者》（*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¹），是当今学者参考最多的一部著作。这本书对于理雅各的传教生涯的论述比较充分，但对理雅各的学术研究则轻描淡写，而对于理雅各所卷入的种种争论则避而不谈。另外由于书中对一些日期的模糊记载，也给读者造成带来了许多不便。这都需要后人研究时加以考证。她关于理雅各在香港建立教堂的记载比较模糊，因为她把四座教堂当作一座来写，从资料来看，她本人可能也以为是一个教堂。理雅各的孙女玛丽·莱格教授（Mary Dominica Legge）在理雅各去世后出生，也写了《理雅各简传》（*James Legge*）。该书尚

¹ 绪论部分凡英语书名均用斜体标明，英语篇名则用正体标明。

未出版，但 1945 年 2 月 4 日，她在爱丁堡大学向中国—苏格兰学会（Sino-Scottish Society）宣读了该文。该手稿与理海伦的传记相比，虽然简单些，但它所提供的线索仍有其参考价值。

学术界第一个有意识为理雅各作传的是 19 世纪 60 年代理雅各的同仁、伦敦会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它见诸伟烈亚力所写的《新教传教士的回忆录》（*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一书中。这篇文章的涉及面比较广，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基督教在中国：早期新教传教士文献》（*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的序言中对伟烈亚力的研究作了肯定。此外，理雅各 1897 年逝世后，人们为纪念他而写的讣告、悼词也是有关理雅各生平的重要资料，如慕维廉（Rev. William Murihead, D.D.）的《忆理雅各》（In Memorial. The Rev. Dr. Legge），该文主要以强烈的宗教情感评价理雅各的成就，但关于他的生平仅是泛泛而谈。理雅各生前敬佩的荷兰学者施古德（G. Schlegel）所写的《悼理雅各》（James Legge）与《纪念理雅各》（Necrology – James Legge）主要是根据他与理雅各的通信写的，他肯定理雅各的翻译成就，较多地介绍理雅各老年时期的活动，内容比较翔实。英国的曼斯菲尔学院（Mansfield College）院长费尔班牧师（Rev.A.M.Fairbairn D.D.）于 1897 年 12 月 3 日在理雅各的葬礼上的发言载于理海伦的《理雅各：传教士与学者》中。原香港大学的赖廉士（Lindsay T. Ride）为理雅各作的《传记》（*Biographical Note*）见于 60 年代香港版的《中国经典》中。赖廉士是第一个为理雅各系统作传的学者，他利用一些原始材料，写得生动而富有生气，强调理雅各在沟通东西方面的作用。1965 年在香港岛的合一堂举行理雅各诞辰 150 周年纪念活动，赖廉士发表了演讲《理雅各 150 周年纪念讲话》（James Legge – 150 Years, an address delivered in the Union Church, Kennedy Road, Hong Kong on 20th, December, 1965 on the sesquicentennial of the birth of Dr.James Legge）。此外布瑞尔（E.J.Bril）与巴克尔（E.H.Parker）也写过纪念文章。

以上可以认为是研究理雅各生平的第一代学者。第二代学者主

要有费乐仁 (Lauren Pfister)、诺曼·吉拉多特 (Prof. Norman Girardot)、黄文江、刘绍麟、宋新、马祖毅、熊文华等人。费乐仁是香港浸会大学宗哲系教授，美国人，居香港已有 15 年。他早年从事传道，在夏威夷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成中英，1987 年始在香港浸会大学任教。他写的专著《为了人生的职责：苏格兰新教传教士理雅各与中国的接触》(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James Legge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 有七百多页，探讨了 1840 – 1873 年间理雅各的传教生涯与学术造诣。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理雅各生平的文章，包括《累累硕果中的磨难——理雅各在华侧记》(The “Failures”of James Legge’s Fruitful Life for China)，《理雅各的遗产》(The Legacy of James Legge)，《理雅各著述研究的新视点》(上篇) (Some New Dimensions in the Study of the Works of James Legge (1815 – 1897) (Part I)，《19 世纪欧洲著名汉学家理雅各生平与学术成果的线索》[Clues to the Lif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One of the Most Famous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an Sinologists – James Legge (A.D.1815 – 1897)]) 等等。

诺曼·吉拉多特教授是美国宾州勒亥大学 (Lehigh University, Pennsylvania, USA) 的宗教史专家，著有《中国文献的维多利亚式翻译——理雅各东方朝圣之行》(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一书，许多笔墨集中在理雅各在牛津的生涯(1876 – 1897)。黄文江博士是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师，其专著《理雅各：中西十字路口的先锋》(James Legge: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 透过中西文化交流角度，研究理雅各的生平及学术成就。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姜嘉荣对该书做了评论，认为“作者对相关史料详熟，除运用理氏本身之著述和理海伦 (Helen Legge) 有关理雅各的记载等第一手资料外，并借助伦敦大学亚非研究所图书馆，关于伦敦会之档案、牛津大学收藏有关理雅各之文献，以及英国政府殖民地部之记录，除探讨理氏成为传教士教育家及学者之经历外，更探讨理氏与香港早期殖民地统治之关系，藉以理解理雅各与香港历史之密切关系。”但是也

提出书中没有关于理雅各反对政府将赌博合法化等问题的论述。此外，黄文江还著有《传教使命、中国文化与殖民统治：19世纪理雅各与欧德理在港活动研究》(*Christian Missions, Chinese Culture and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A Study of the Activities of James Legge and Ernest John Eitel in Nineteenth Century Hong Kong*)。三位学者的研究在读者面前展示了理雅各生平活动比较清晰的画面。刘绍麟的《香港华人教会之开基》从解读差会的原始资料入手，尽管不是关于理雅各的专著，但有关的内容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和参考价值。

澳大利亚中国籍学者柳存仁，中国大陆学者宋新、马祖毅、熊文华以及光盘资料《中国大百科全书》关于理雅各的生平有一些叙述，可作为一般性的参考文献。至于各类文献中以转载的资料写的一两段关于理雅各生平文字的文献就非常多了，大抵都为重复的文字，这里不一一列举。

2. 有关理雅各宗教学术的研究

早期评论理雅各的宗教学术研究的学者有《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的编辑德呢克 (N.B.Dennys)，他认为理雅各过高评价儒教，也指责理雅各的一些年代考证有错误，但总体上肯定理雅各的功绩。孙罗伯 (Robert N. Nelson) 对理雅各的《儒教与基督教的对比》(*Confucianism in Relation to Christianity*)做了评论。牧师安保罗 (P. Kranz) 编录的《理雅各批判儒教的部分材料》(*Some of Professor J. Legge's Criticisms on Confucianism*)一书，把理雅各教授批判儒教的部分材料进行整理出版。这些早期的文章在学术性上还无法与现代学者的研究相比，一般仅是随感式、点评式的，并情感化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在对理雅各的宗教学术作研究的学者中，水平较高的当推上述提到的两位学者费乐仁与诺曼·吉拉多特。费乐仁的《论19世纪欧洲儒学研究的三个代表流派》(*Notes on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Representations of Confucianism in Europe*)、《再论马克斯·韦伯对儒家经典的评价》(*Reassessing Max Weber's Evaluation of the*